



**University of
Zurich**^{UZH}

**Zurich Open Repository and
Archive**

University of Zurich
University Library
Strickhofstrasse 39
CH-8057 Zurich
www.zora.uzh.ch

Year: 2016

The Russian Formalists as a Community. Variant (chinesisch): “Zuo Wei Yi Ge Ji Qun De E Luo Si Xing Shi Lun Xue Pai”. Trans. Dan Liu

Glanc, Tomáš

Other titles: Zuo Wei Yi Ge Ji Qun De E Luo Si Xing Shi Lun Xue Pai

Posted at the Zurich Open Repository and Archive, University of Zurich

ZORA URL: <https://doi.org/10.5167/uzh-131669>

Journal Article

Originally published at:

Glanc, Tomáš (2016). The Russian Formalists as a Community. Variant (chinesisch): “Zuo Wei Yi Ge Ji Qun De E Luo Si Xing Shi Lun Xue Pai”. Trans. Dan Liu. Social Science Front, 2016(11):233-246.

作为一个集群的俄罗斯形式论学派

[捷克] 托马斯·格兰茨

(苏黎世大学, 苏黎世 Plattenstrasse 街43号 8032)

摘要: 俄罗斯形式论学派, 以激进的姿态试图将文学研究建设为一个自足的学科。形式主义的传统对于后来的结构主义乃至现代诗学的发展都至关重要。这些发展涵盖语言学与文学之间的密切互动。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不仅拥有一套概念与策略, 更是既以集体声音也以个人声音促进思考、行动与交流的一个学术集群。

关键词: 俄罗斯形式主义; 什克洛夫斯基; 蒂尼亚诺夫; 雅各布森; 托马舍夫斯基; 学术集群; 结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 H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6) 11-0233-14

1910年至1930年间, 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所进行的文学理论变革彻底改变了20世纪的人文科学。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将其描述为一场“动荡不安的”“离经叛道的”^①以及“难以控制的”^②运动。如是, 我们还是很难界定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然而, 从历史角度而言, 我们可视其为文学研究寻求自立的一种积极努力。1915年前后, 一群学习文学与语言学的年轻学子着手这一工作, 他们松散地组成了两个不同的学派: 彼得堡诗语研究会 (ОПОЯЗ) 和莫斯科语言学小组 (MLC)。尽管二者存在诸多不同, 但也有着以下共同观点: (1) 诗性 (文学) 语言不同于日常 (实用) 语言; (2) 前者被界定为对后者的反叛或创造性的改变; (3) “艺术是手法”^③; 对艺术而言, “怎样”及“为了何种目的”的重要性远胜于“什么”及“出于什么原因”; (4) 文学在本质上应被视为一种现象, 而非文学外各种现象的表现, 比如社会关系 (如马克思主义所言) 或精神情结 (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所言)。除了以上根本假设, 我们还应加上 (5) 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紧密互动^④, 以及最后 (6) 将文学研究作为精确科学的愿望^⑤。

尽管什克洛夫斯基 (Shklovsky) 早在1914年就发表了纲领性的申明, 但彼得堡诗语研究会正式运作始于1916年, 并于1923年解散。其核心成员包括: 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 (Viktor Shklovsky)、鲍里斯·艾亨鲍姆 (Boris Eikhenbaum)、尤里·蒂尼亚诺夫 (Yuri Tynyanov)。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成立于1915年, 活动直至1924年。该小组第一任主席是罗曼·雅各布森 (Roman Jakobson), 在他1920年1月离开俄罗斯之前一直担任该职。主要成员有: 民俗学家彼得·鲍加兑廖夫 (Petr Bogaty-

基金项目: 北京语言大学梧桐创新平台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16PT02)。

作者简介: 托马斯·格兰茨 (Tomáš Glanc), 瑞士苏黎世大学教授, 研究方向: 斯拉夫文论。

① Victor Erlich, *Russian Formalism: History-Doctrine*, 2nd rev. eds., The Hague: Mouton, 1965, pp. 153, 286.

② Peter Steiner, *Russian Formalism: A Metapoe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43.

③ 什克洛夫斯基开创性的文章 (1916) 的标题。

④ 但我们可辩称“尽管存在共同基础, 他们开辟了不同的方法: 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更偏向语言研究, 而对彼得堡诗语研究会而言, 语言学仅仅是一个有关的、有益的学科, 文学研究从中可以获取方法上的创新”。Peter Grzybek, “Russian Formalism,” in *Encyclopedia of Semiotics*, edited by P. Bouissac, pp. 550-55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551.

⑤ 参见 Victor Erlich, *Russian Formalism: History-Doctrine*, 2nd rev. eds., The Hague: Mouton, 1965 以及 Igor Pilshchikov, “Il ret-aggioscientifico del formalismorusso e le scienze umane modern,” *Enthymema*, Vol. 5, 2011, pp. 70-102.

rev, 创始人之一)、语言学家格里戈里·维诺库尔 (Grigori Vinokur, 1923—1924 年任小组主席)、中世纪研究者鲍里斯·亚尔霍 (Boris Yarkho)、哲学家古斯塔夫·什佩特 (Gustav Shpet) 等。雅各布森、左派学者奥西普·布里克 (Osip Brik) 和话语语言学及诗歌研究者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 (Boris Tomashevsky) 积极参与了这两个学派的活动。如艾亨鲍姆所言, 如果彼得堡诗语研究会代表“新闻式的”批评 (非学术, 但也并非业余), 那么, 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则代表了学术研究, 因为后者成立于莫斯科大学, 且得到官方组织俄国科学院的批准。

与此同时, 莫斯科语言学小组也并非一同质的群体。早在 1920 年间, 一些年轻的成员, 如马克西姆·科尼格斯伯格 (Maksim Kenigsberg) 和尼古拉·森金 (Nikolay Zhinkin) 是什佩特的追随者, 什佩特则是胡塞尔思想在俄罗斯的主要倡导者。现象学者们同雅各布森任主席时成为小组主体的那些经验论者意见相左, 他们想要在符号学基础上而非音位学基础上建立诗学体系, 并将语言作为最佳的符号现象^①。经验论者 (如雅各布森、鲍里斯·亚尔霍) 认为诗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 现象论者 (如什佩特、科尼格斯伯格) 则将其视为符号学的一部分。尽管这一分歧导致了 20 世纪 20 年代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分崩离析, 雅各布森仍将这两种方法综合于其后来的研究之中。

即便在彼得堡诗语研究会和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终止运作之后, 其成员继续在列宁格勒的国家艺术史研究所 (GUI, 成立于 1912 年, 1931 年斯大林独裁后被关闭) 和莫斯科的国家艺术科学院 (GA-KhN, 1921—1930) 开展研究。蒂尼亚诺夫和艾亨鲍姆在国家艺术史研究所的追随者们, 包括莉季娅·金茨堡 (Lidiya Ginzburg) 和鲍里斯·布赫什塔波 (Boris Bukhshtab) 以“年轻的形式主义者” (mladoformalisty) 而著称。1926 年雅各布森成为位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语言学小组 (其名称反映出与之前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关系) 的创始人之一。自此, 形式主义以及由其发展而来的结构主义开始在欧洲传播。后来, 随着雅各布森移居美国, 又开始了其在北美的影响。雅各布森将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和布拉格语言学小组作为研究斯拉夫结构语言学和诗学的组织架构和纲领性模式。

俄罗斯形式论学派试图建立一种独立的文学研究体系, 这成为现代文学理论及其附属学科 (如叙事学、小说研究等) 发展的根基。形式论学派率先提出了一些观点, 如“陌生化”“编织情节”“策略”“动机”等, 这对于文学发展的现代理解至关重要, 且在新批评 (20 世纪中叶)、后结构主义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及其他运动与流派中得以继续发扬。

由于形式论学派好反叛、好争辩, 且缺乏一致性和凝聚力, 这个学派的许多学说成果和遗产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显得颇为脆弱。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 这一运动迫于斯大林政权的政治压力而分崩离析, 有人却认为是其理论穷尽的结果。形式论学派观点的最终影响被转化为之后的传统, 如结构主义, 或者不那么明显地转化成为巴赫金学派和塔尔图—莫斯科学派 (TMS) 的观点。因此, 当下人们通常通过这些典范理论的棱镜来审视俄罗斯形式论学派, 将其作为不成熟的、暂时的先驱者, 如斯坦纳所言^②, 其属于斯拉夫文学研究的“典范之间阶段”。另一方面, 近年的研究^③ 认为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根植于 20 世纪早期丰富而复杂的理论背景中, 其深度超过早期学者研究的推测。他们认为, 形式主义并非一时短暂的、不成熟的准备阶段的学说, 且被后来更为有力的研究范式所超越, 而是激烈

① Maksim Shapir, “M. M. Kenigsbergi ego fenomenologiyastikha,” *Russian Linguistics*, Vol. 18, No. 1, 1994, pp. 73–113.

② Peter Steiner, *Russian Formalism: A Metapoe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69.

③ Aleksandr Dmitriev, “Le contexte européen (Français et Allemand) du formalisme russe,” *Cahiers du monde russe* 43 (2–3): 423–40, 2002; Ekaterina Dmitrieva, Michel Espagne, and Valeriy Zemskov eds., *Evropeiskiy kontekst russkogo formalizma: K probleme esteticheskikh pere-shecheniy. Frantsiya, Germaniya, Italiya, Rossiya*, Moscow: IMLI, 2009; Patrick Flack, “Le formalisme russe entre ferment neo-kantien et linguistique structurale,” In *L'arrière-plan linguistique du formalisme russe*, edited by Sylvie /Xrchaimbault and Sergei Tchougounnikov, Paris: Institut des Etudes Slaves, 2014; David Romand, Serguey Tchougounnikov eds., *Psychologie allemande et sciences humaines en Russie: anatomic d'un transfert culturel (1860–1930)*, Auxerre: Sciences Humaines, 2009; Ilona Svetlikova, *Istoki russkogo formalizma: traditsiya psikhologizma i formal'naya shkola*, Moscow: Novoe literaturnoe obozrenie, 2005.

论争和对话的关键阶段，它自身的潜力并没有被后来的研究传统所覆盖。因此，我们需要借助新的方法来理解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尤其要关注其活跃的学术圈中复杂而微妙的结构。

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研究激发了某些具体的思考、行为及交流的方式，而没有形成一套独特的概念或带修辞色彩的论争及策略。首先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学术圈”如何成为一种具有施为功能的、超越个体的行为。

这种探寻并非致力于讨论在某些方面与形式论学派的文学研究有关的作者们所提出的策略、术语、类别及概念。关注群体可从其他角度揭示这一群体的思想史，将其作为具有追溯力的尝试，用集体实践的方式来考虑人文学科的理论假设；将其作为一个具有社会与政治维度的平台；不仅将其定位于可以代表一系列规则，而且代表对各种合作、协作、学派意识（或挑战学派意识）及策略的排斥及限定。将俄罗斯形式主义作为一个学派研究，并不意味着排除学者们与其所创造的非正式及正式组织的历史的联系。相反，学派研究关注的问题在更大程度上是其参与者所产生的影响，或他们作为一个学派具有的特点。我们可能将某些形式主义者的做法当作一个集群的行为，一种与形式主义有关的行为、程序、影响的总和，一种不同作者的智力活动。尽管存在个体差异，他们却共同创造了一个（尽管是异构的）整体。

第一阶段：组织化行为及成员资格论争

尽管形式学派的理论诉求超越了个体作者的界限，但它们并非总以学派的形式出现。而且，学派并不一定会经历常规的制度化改变，换言之，是从自我指向、自我组织的过程或个体行为形式过渡到有组织、有管理的形式。即便如此，1915至1920年间，彼得堡诗语研究会和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将形式主义制度化了。杰出的俄罗斯语文学史专家马克西姆·沙丕尔（Maksim Shapir）强调了这两个组织中学者们所发挥的作用，他指出在形式主义成为经典的过程中制度化所起的作用。同时，在他看来，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在创建形式论学派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被低估，“尽管缺乏自己的出版基地和官方出版物，尽管其学术组织缺乏先锋的亮点，在（与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激烈的内部深层矛盾中产生了举世闻名的彼得堡诗语研究会，它进而成为形式论学派的符号。然而创造一种新语言学的主要工作实则是在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内部完成的”^①。在上述引文中，类似“官方”“基地”和“组织”这样的表述表明某一潜在组织的战术和战略。同样，被封为经典的机制（“成为遍布全球的”）表明这一组织首先是一个工具，甚至不可避免地成为学派自身定位的内部发展与外部影响的前提。组织的确立是构建集体立场的最有决定性的方法之一，是对“接受”行为的一种认同。艾亨鲍姆通过组织成员（而非传统的管理特点）界定形式主义者：“我在本文中所说的‘形式主义者’是指一群组成了诗语研究会（即彼得堡诗语研究会）的理论家们，他们从1916年起开始发表其研究成果。”^②尽管雅各布森试图将彼得堡诗语研究会与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相提并论，艾亨鲍姆的这一观点仍深深地影响后来者。比如韦勒克就认为是彼得堡诗语研究会而非其他别的组织“成了俄罗斯形式主义运动的核心”^③。甚至莫斯科形式主义是否存在也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④这些怀疑本身建立在形式主义者的自我反思上：在他们的著作中，他们故意否认形式主义的存在。事实上，斯坦纳将形式主义看作一

^① Maksim Shapir, “Vstupitel'nayazametka,” *Philologica*, Vol. 3, (5/7), 1996, pp. 361–365.

^② Boris Eikhenbaum, “The Theory of the ‘Formal Method’,” in *Russian Formalist Criticism: Four Essays*, edited by Lee T. Lemon and Marion J. Reis, pp. 102–139.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5, p. 102.

^③ René Wellek, “The Main Trends of Twentieth-Century Criticism,” *The Yale Review*, Vol. 51, No. 1, 1961, pp. 102–118.

^④ Catherine Depretto, *Le Formalisme en Russie*, Paris: Institut d'études Slaves, 2009, pp. 162–176; Aleksandr Dmitriev, “Kak sdelana ‘formal’ no-filosofskaya shkola’ (ilipochemu ne sostoyalsyamoskovskiyformalizm?),” in *Issledovaniya po istorii russkoy mysli: Ezhegodnik 2006–2007* (8), pp. 121–140. Moscow: Modest Kolerov, 2009.

种“元诗学”，关注“机械”“有机体”或“体系”，认为这一运动的独特性在于一种“免疫性”，拒绝人们以综合的方法理解它。^① 尽管斯坦纳最后试图追踪文学研究的连续性，但他首先关注的却是形式主义者自己对形式主义的否定。我们无法认同斯坦纳的说法，他认为托马舍夫斯基在其论文《代讣告》(*Instead of an Obituary*)^② 中完全否认形式主义的存在。在1925年4月12日他写给什克洛夫斯基的信中，托马舍夫斯基将形式主义的方法等同于提出新的方法论问题，而不是“关于文体、节奏或情节的简单的形式类别表述”^③。另一方面，作为形式论学派的核心成员，艾亨鲍姆公开宣称不存在所谓的形式主义方法。^④ 同样，日尔蒙斯基(Zhirmunsky)^⑤ 也怀疑作为批评方法的形式主义存在。

奇怪的是，尽管一些形式主义者否认自身的存在，他们主要的批评者们则强调形式主义者共享的立场，并以一种否定的方式强调其存在。比如，1923年6月26日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真理报》(第166期)发表了《诗歌的形式主义学派和马克思主义》一文，并收入《文学与革命》(2005)文集。鲍里斯·恩格尔加特(Boris Engalgardt)撰写了模棱两可的辩解书(1927)。罗莎莉亚·肖尔(Rosalia Shor)(1927)进行了绝妙分析，巴维尔·梅德维捷夫(Pavel Medvedev)在其著作《文学学中的形式论方法：社会学诗学引论》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有趣的是，梅德维捷夫是一位有着丰富的创建工作团队经验的理论家，也是1917年最后一位民主选举的维捷布斯克市市长。在随后的战争年代，他组建了维捷布斯克国立大学，并在该大学成立了自由美学协会；作为组委会主席，他还创办了艺术与人文学院。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还是维捷布斯克巴赫金学派的组织者之一。不仅如此，1923年，梅德维捷夫当选为全俄作家协会彼得格勒分会委员。由于他和其他一些早期苏维埃语文学或政治学的杰出人物批评形式主义，人们可以讨论形式主义的“负面经典化”，可以认为对它的批评或负面评价只是增加了在其支持者眼中的合理性及重要性。但是，在后续对形式主义的批评中(参阅什克洛夫斯基1930年对形式主义的否定)，没有哪位形式主义者像梅德维捷夫那样遭受更为严重的迫害，他被捕入狱，并于1938年被枪决。然而，在对形式论学派的历史迫害中，受害者的形象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值得深入探讨。

不可能的联合，无法运转的学派

尽管人们对形式论学派的观点作为一个统一的理论立场有诸多怀疑，我们从中也看到人们不断强调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和彼得堡诗语研究会的差别。^⑥ 与此类似，研究形式论学派的学者们经常将其细分为不同分支、阶段以及倾向^⑦ (Hansen-Löve 1978)。斯坦纳认为^⑧，首先应将形式主义理论理解为在俄罗斯未来派激进主义的艺术及理论助力下，一种同20世纪初占据俄罗斯学界的各种文学批评流派论战的回应。这些流派包括谢苗·温格罗夫(Semen Vengerov)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Aleksandr Veselovsky)的历史诗学以及亚历山大·波捷布尼亚(Aleksandr Potebnya)的心理学—语言学诗学。然而，我们可以雅各布森与波捷布尼亚的关系发展为例质疑这一假设。

① Peter Steiner, *Russian Formalism: A Metapoe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9-10.

② 该论文1925年正式发表，但早在1922年就以报告的形式推出。

③ Lazar Fleishman, “B. V. Tomashevsky v Polemike vokrug formal'nogo metoda,” *Slavica Flierosolutitana*, Vol. 3, 1978, pp. 384-388.

④ Boris Eikhenbaum, “Vokrugvoprosa o formalistakh,” *Pechat' irevolutsiya*, Vol. 5, 1924, pp. 1-12.

⑤ Viktor Zhirmunsky, “Foreword,” in Oskar Walzel eds., *Problemaformty v poezii*, Petersburg: Academia, 1923, pp. 5-23.

⑥ Mikhail Gasparov, “‘Nauchnost' i khudozhestvennost' v tvorchestve Tynyanova,” In *Tynyanovskiy shornik: Chetvertye Tynyanovskie chteniya*, Riga: Zinatne, 1990, pp. 12-20.

⑦ Aage A. Hansen-Löve, *Der russische Formalismus: Methodologische Rekonstruktion seiner Entwicklung aus dem Prinzip der Verfremdung*, Vienna: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78.

⑧ Peter Steiner, *Russian Formalism: A Metapoe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8.

起初，雅各布森将波捷布尼亚视为主要对手（参阅1919年莫斯科语言学小组草案），但后来（在他1935年所做的关于形式论学派的讲座中）却将其与维谢洛夫斯基一起视为形式论学派的主要先驱。在同一语境中出现这两个名字并非偶然。继鲍里斯·恩格尔加特之后，我们可以追溯这两支形式主义的前辈：彼得堡诗语研究会和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经验论者发展了维谢洛夫斯基的传统，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和国家艺术学院中的现象论者发展了波捷布尼亚传统。

当代史学家们发现，尽管说法有所不同，20世纪20年代中期形式论学派内部存在一些形式主义者设定的原则：如异质性、“拼凑”诗学、缺乏统一的概念工具等。因此，在讨论形式主义者“发现”文学观念的那篇文章开头，谢尔盖·森金（Sergey Zenkin）总结了形式论学派（徒劳的）努力：他们试图形成统一定位，这是其独特的属性之一：“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方法的突出特点，在于其概念工具充满矛盾、毫无形式”^①。

如果形式论学派的特点在于其“无形式性”，如果形式论学派的主要人物就其成员资格争吵不休，那么，如何将其视为统一构建的学派？事实上，人们不断提及形式论学派缺乏统一基础，这些论断构成了这一学派“无法”运作的前提，或者更准确地说，按照让-吕克·南锡（Jean-Luc Nancy）极具影响力的专著《不运作的学派》（1986）的标题所示，是其“不能运作”的前提。如同法国哲学家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在论文《无以言明的学派》（1988）的回应，从这个角度研究形式论学派需要做自我分析，尤其考虑到该主题激发了广泛的学者论争。^②然而，这一政治化讨论的基本点准确地捕捉到现代学派中集体（自我）认同的经历，我们在这里有所提及，因为它至少可以指引未来研究的方向。我们不妨引用叶莲娜·彼得罗夫斯卡娅（Elena Petrovskaya）的观点，这位学者是南锡著作最优秀的俄罗斯评论家，她做出如下表述：“20世纪80年代的著作提供了研究集群（communaute）现象的多层面分析，并非将其作为一个有机体，而是一个个体网络，在其边缘他们互相表达（南锡所说的个体不仅是单个的人，还包括小组、社团、机构和论述）。 ”^③的确，将学派理解作为一种令人着迷的可能性，将其看作一个无法抵达终点的轨道，这构成了解形式主义整个工程的一个相当令人信服的解释方式。

征服前辈：无主物和形式主义辩证法

形式论学派的各种理论为其脆弱的特性增加了一些稳固因素，将文学研究的倾向与现代主义伟大的政治和文化工程连接起来。其中，构建“我们”具有重要意义。这里的“我们”构成了表达的基础，它假定并创造了大家可能共享的立场。的确，形式主义的文本间或通过语法来展示其自我认同，即作者们使用第一人称复数表达观点。1927年，艾亨鲍姆提到“所谓的”形式主义方法，将这个形容词放在引人注目的引号中，然而，“我们”是不会出错的：“原则上讲，形式主义的问题不在于如何研究文学，而在于文学研究的主题到底是什么。我们从不讨论方法论，也从不就此论争。我们讨论且仅仅讨论理论原则，这些原则并不是来自现成的方法论，而是来自研究具体材料的具体语境。”^④什克洛夫斯基以相似的方式构建了一个未明确定义的复数“我们”：“重要的是，我们努力生产性地（*proizvodstvenno*）研究艺术，我们必须从声音开始”^⑤。

^① Sergey Zenkin, *Raboty o teorii*, Moscow: Novoe literaturnoe obozrenie, 2012, p. 305.

^② Giorgio Agamben, *The Coming Community*,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3.

^③ 转引自 Vyacheslav Stepin, eds., *Novaya filosofskaya entsiklopediya*, Moscow: Mysl', 2001, p. 12.

^④ Boris Eikhenbaum, "The Theory of the 'Formal Method'," in *Russian Formalist Criticism: Four Essays*, edited by Lee T. Lemon and Marion J. Reis, 102-139.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5, p. 102.

^⑤ Viktor Shklovsky, "Pamyatnik nauchnoy oshibke," *Literaturnaya gazeta* (January 27), 1930, p. 65; Viktor Shklovsky, *Third Factory* (1926), Chicago: Dalkey Archive Press, 2002, p. 38.

与学派的不稳定相关,讨论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将文学史作为无主物的论断很有意思。维谢洛夫斯基写作了《历史诗学》(1893)一书,也是形式主义者们的先驱(同时还是其对手)。在常常被引用的《历史诗学》的序言中,他认为文学史可唤起一种地理疆界的记忆,国际法将其奉为无主物。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这一区域或疆界(比喻义),它不属于任何人,没有身份,或准确地说,它的身份是含混的。文学史学者、美学家、社会思想的博学者都在这一领域探寻,各取所需。雅各布森在其讽刺性逸事中含蓄地提到这一观点,雅各布森将那些转向文本外事实研究的学者比作大街上为了抓住凶手而逮捕所有人的警察。既然如此,语文学家组成的学派是一群“零”财富的守卫者,按照维谢洛夫斯基的说法,是居住在无主物区域的居民或者是一些雄心勃勃的激进警察,专门与敌人展开交锋,而与其他人不同,他只是间接与谋杀案(即艺术品)有关。形式主义者在维谢洛夫斯基无主物的疆界上建立了乌托邦王国,与其人种的、遗传的以及心理的决定论^①相悖,他们坚持认为自己知道在这个新国家应执行哪些法律,存在何种政治秩序。

在什克洛夫斯基的《第三工厂》(1926)中,形式主义被建构成统一体。虽然与维谢洛夫斯基交锋,但《第三工厂》也揭示了维谢洛夫斯基及无主物对形式主义者的重要意义。论及学派的存在,集体声音与个体声音之间的摇摆不定尤其重要。它表达了形式主义者们的集体认同感具有强烈且不稳定的特性。比如,什克洛夫斯基在一处提到了“学派”(专指彼得堡诗语研究会,而非形式主义),但立刻将其变为一种“我”的形式,而没有解释这一转变的原因:“彼得堡诗语研究会与维谢洛夫斯基学派的区别在于后者将文学演进视为缓慢改变、不易察觉的现象累积。我认为,情节以辩证的方式发展,摒弃原本的形式,且戏仿自己。”^②什克洛夫斯基关于冲突和文学进程转向的概念,接近蒂尼亚诺夫对“演变”的理解,都基于戏仿,在这一构想中以个人成就的形式出现,自动被彼得堡诗语研究会接受。这样的摇摆不定似乎是形式主义脆弱团体的症状。

什克洛夫斯基假定“情节以辩证形式发展”,这是形式主义作为一种辩证现象自我反思的结果。深入理解辩证逻辑可用于建构团体身份,这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尤其如此。自1925年起,形式主义者敏感地捕捉到辩证逻辑,彰显其在形式主义方法之上建构社会附属物的尝试中所起的作用。1935年,罗曼·雅各布森在布尔诺所做的关于形式主义方法的讲座中,他将“辩证唯物主义”与“盲目经验主义”并置处理。

除了考虑形式主义科学的社会学意义,我们还需考虑其意识形态。辩证法是形式主义自我批评的内容之一。居住在纳粹德国占据前的捷克斯洛伐克,雅各布森对文体的解释令人联想起当今马克思主义话语:“经证明,形式主义无法接受艺术演化一致的辩证观,且与社会生活的其他成分无关。”^③在20世纪20年代对抗形式主义的运动中,雅各布森注意到一种“声音内核”。在他看来,“形式主义发展停滞不仅由于外部的侵犯,还由于形式主义学者的内部矛盾”^④。20世纪30年代雅各布森书写形式主义历史时它才刚开始发展,却在危机中很快结束了。显然,在雅各布森看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即其辩证法,可以成功地化解这一危机。在讲座中,雅各布森赞赏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它是研究“形式问题”的最佳基石。^⑤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将形式看作辩证思维的根本组成部

^① Aage A. Hansen-Löve, *Der russische Formalismus: Methodologische Rekonstruktion seiner Entwicklung aus dem Prinzip der Verfremdung*, Vienna: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78, pp. 230-231.

^② Viktor Shklovsky, *Third Factory* (1926), Chicago: Dalkey Archive Press, 2002, pp. 57-58.

^③ 转引自 Tomáš Glanc eds., *FormaVnaya shkola i sovremennoe russkoe literaturovedenie*: Brno 1935, Moscow: Yazyki slavyanskikh kul'tur, 2011, p. 83.

^④ 转引自 Tomáš Glanc eds., *FormaVnaya shkola i sovremennoe russkoe literaturovedenie*: Brno 1935, Moscow: Yazyki slavyanskikh kul'tur, 2011, p. 83.

^⑤ 转引自 Tomáš Glanc eds., *FormaVnaya shkola i sovremennoe russkoe literaturovedenie*: Brno 1935, Moscow: Yazyki slavyanskikh kul'tur, 2011, p. 24.

分,根据黑格尔的观点,与机械唯物论相比,它与唯心主义哲学经典具有更多结合点”^①。

形式主义者的聚会与作为私有教育机构的形式主义

形式论学派既有组织结构又有非正式活动。这一现象,在后来的布拉格语言学派和雅各布森离开纳粹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后发起成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学派中都重复出现。因为差异巨大,这两个学派要分别论述。但“官方”与“个人”之间的张力都很重要。

沙丕尔^②称从1918年秋天开始,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成为一个官方机构,具有法人实体和公章,隶属教育人民委员部,直至1923年一直从政府获得资助。早期的聚会地点是在雅各布森家里。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布拉格语言学派,聚会的地点通常在咖啡馆或布拉格酒庄。官方机构地位与热情的个人学术工作相结合巩固了形式论学派的地位,建立了该学派的原则。个人客厅的私密空间带给形式论学派一种非正式的色彩。(讨论)可以进入私家客厅,以即席发言的方式在工作之余的时间进行。他们讨论的话题非常生动,探讨的内容也非常重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行为具有盲目跟随、非官方的特点,与那些既定的组织及其科学形成对照,后者严格定位于各种制度程序之中。的确,该学派通常处于那些狭隘的框架之外,其观点非同寻常,在符号层面无法将他们纳入现存的组织结构。形式论学派采用了一种真实的教育机构的形式,创造出形式主义的学术研究。艾亨鲍姆和蒂尼亚诺夫在国家艺术史研究所任教,其弟子与他们的老师一起在研讨会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集群,他们教学相长。莉季娅·金茨堡强调在这个群体中她就是个学生。同时,她在文集中提到,她按照自己的方式选择形式论学派的精神遗产,它看似不仅与形式主义的简单定义相悖,而且代表了该运动的多样性特点。“我起初是彼得堡诗语研究会成员的学生,但是我主要师从蒂尼亚诺夫。他的影响以及我自己的倾向使我对文学研究仅仅关注文本内在特性失去了兴趣”。^③

形式论学派研讨会的重要特点在于其私密、内部、个人及非正式特色。1924年,艾亨鲍姆在其日记中写道:“家庭研讨会令我开心,志趣相投的伙伴,巴明(A. G. Barmin)对这一双关语的点评可圈可点。斯捷潘诺夫(Stepanov)、斯基皮纳(Skipina)、布赫什塔波(Bukhshtab)、齐尔博(Zilber)、古列夫林(Gurevnik)和金茨堡(Ginzburg),他们都很厉害。”^④卡维林(Veniamin Kaverin)是一位作家兼年代史编者,他则强调聚会的地点在私人客厅:“毕业之后那些最有才华的学生……开始聚集在蒂尼亚诺夫或艾亨鲍姆家的客厅,进行最高级别的研讨。”^⑤教育功能赋予形式论学派一种典型意义。几年之后,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却试图通过国际会议与纲领性论文来确立其地位,^⑥由于各种原因,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仍在很大程度上占据国内的学术“市场”。

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和“研讨”的作用依然不够清楚,不仅因为反对形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运动,还因为其时间持续较短,1927年就结束了。莉季娅·金茨堡是最杰出的年轻的形式主义者(mladoformalisty)之一。她记述道:“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艾亨鲍姆)说,‘我们没什么可教的了’。”^⑦事实上,在蒂尼亚诺夫看来,研讨的终止源自“老师们”的失望,他们不希望下一代人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似乎形式论学派的代表人物没有打算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将形式论发展成一个稳定

① 转引自 Tomáš Glanc eds., *Forma Vnaya shkola i sovremennoe russkoe literaturovedenie*; Brno 1935, Moscow: Yazyki slavyanskikh kul'tur, 2011, p. 121.

② Maksim Shapir, “Vstupitel'naya zametka,” *Philologica*, Vol. 3, (5/7), 1996, pp. 361–365.

③ Lidiya Ginzburg and Alla Latynina, “Chtoby skazat' novoe i svoe...” *Voprosy Literatury*, Vol. 4, 1978, pp. 182–197.

④ 转引自 Lidiya Ginzburg, *Zapisnye knizhki: vospominaniya*, St. Petersburg: Iskustvo-SPb, 2002, p. 445.

⑤ Veniamin Kaverin, Vladimir Novikov and Andrei Turkov, *Novoe Zrenie: Kniga oYuri Tynyanove*, Moscow: Kniga, 1988, p. 210.

⑥ 首先出现于1929年在布拉格举行的第一届斯拉夫国际大会上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提交的论文中。

⑦ Lidiya Ginzburg, *Zapisnye knizhki: vospominaniya*, St. Petersburg: Iskustvo-SPb, 2002, p. 445.

的经典教义。他们希望学生们能找到全新的视角，但他们不满意：“这一代人患上了贫血病，我们供给他们的营养不够，而他们也胃口不佳，之前我已经拒绝编辑这些年轻人论当代文学的文集，因为我与他们观点不同。”^①

然而，我们还是可以追踪一些形式主义者的学生们持有的立场，他们确实清楚而明智地表达了与前人不同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因此而呈现在较为统一的平台上，形成了一个不够稳定且多样化的集群。斯坦尼斯拉夫·萨维茨基（Stanislav Savitsky）用生动的例子讨论了形式主义者与其学生的论争（我们在引文中省略了其各自的出处）：“1926年，在艾亨鲍姆举办的研讨会上，布赫什塔波提交了一份报告，名为《文学文本内在理论批评》。霍夫曼（V. Gofman）提交的报告则质疑如何将基于未来主义美学的形式论方法运用到文学现象之中，还包括瑞利夫（Ryleev）的著作……到1926年，他努力与所有的老师论争，宣称要寻求一个新的研究目标，几年之后他发表了一篇对什克洛夫斯基著作的犀利评论。金茨堡也与她的老师蒂尼亚诺夫展开了论争。”^②

研讨的双方，“老师们”和“学生们”都积极参与到了学派的消亡之中。教学与承继的想法显然有吸引力，但参与方都缺乏教育过程所必需的诚意与折中方案。

总部与中间地带

初看形式论学派成员的数量，该学派的物理形态没有特别之处。人们对形式主义的接受受到自然现象的影响，形式主义者自嘲为“将帅的历史”^③。成员中有些人被写入历史，而另一些人则默默无闻。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如同1926年后的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成员归属的问题非常关键，尽管事实是其成员的准确身份以及当时的影响范围一直无法确定，可我们还是能看到成员的名单，该名单包括来自不同学科和年龄层次的学者。近期的研究表明，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成员划分的标准非常多元。它不仅包含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还提供了一种辨识成员方法的经典范例^④。

在参考书目（以及学者们的集体意识）中，每个学派都拥有仅仅属于一些“主要”人物的空间。^⑤但集体在学派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而且从今天的视角看，它包括一些看上去不太重要的人物。但他们积极参与其中，这对于学派在学术以及社会环境中所处的地位非常重要。

该学派的典型特点是围绕某个人与学派的关系问题展开探讨。即便是像托马舍夫斯基这样杰出的形式主义者也会遭遇是否属于该学派的怀疑与质疑，这一点在丹尼斯·乌斯基诺夫（Denis Ustinov）的著作中得以呈现。不幸的是，乌斯基诺夫并没有讲明他提到的托马舍夫斯基被当作外来者这一信息的来源：“同样，托马舍夫斯基的理论探究有时被排除在形式论学派著作之外，尽管有材料可以明确证明：那些毫无争议的形式主义者（至少包括什克洛夫斯基和蒂尼亚诺夫）认为，托马舍夫斯基完

① Yuri Tynyanov, *Poetika, istoriya literatury, kino*, Moscow: Nauka, 1977, p. 569.

② Stanislav Savitsky, “Spot s uchitelem: nachalo literaturnogo/issledovatel'skogo proekta L. Ginzburg,” *NLO*, Vol. 82, 2006, pp. 129–154.

③ 蒂尼亚诺夫在敬献给艾亨鲍姆的文章《论文学演进》中有所提及，“文学科学的理论价值已形成了研究少数几个主要现象的危险性，使文学史成为一种‘统帅’的历史”。Tynyanov Yuri, *Poetika, istoriya literatury, kino*, Moscow: Nauka, 1977; Tynyanov Yuri, *Arkhaisty i novatory*, Leningrad: Priboy, 1929.

④ Petr Čermák, Claudio Poeta and Jan Čermák eds, *Pražský lingvistický kroužek V dokumentech*, Prague: Academia, 2012, pp. 357–401.

⑤ 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成员包括雅各布森、维诺库尔、托马舍夫斯基、雅尔霍、布里克和鲍加兑廖夫，也包括著名诗人马雅科夫斯基，他也积极参与到这些论战中。1923年后，还包括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什坦姆、阿谢夫。（Catherine Depretto, *Le Formalisme en Russie*, Paris: Institut d'Etudes Slaves, 2009; Maksim Shapir, “Vstupitelnaya zametka,” *Philologica* 3 (5/7), 1996, p. 362; Maksim Shapir, “Moskovskiy lingvisticheskiy kruzhok (1915–1924),” In *Rossiyskaya nauka na zare novogo veka*, edited by Vladimir Skulachev, Moscow: Nauchnyy mir; Priroda, 2001, pp. 457–464.

全参与了形式论学派的工作，还是彼得堡诗语研究会的核心成员。”^①

如同其当代的深刻反省，从历史语境看，形式主义论争包括一些立足建构集群的学术活动。通过论争来寻求集群，这些活动产生了某些争辩的中间地带。例如，从1925年起，扬·穆卡若夫斯基（Jan Mukarovsky）反对将布拉格结构主义归属于俄罗斯形式主义。^②在他看来，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以约瑟夫·多迪克（Josef Durdik）、奥托卡尔·齐赫（Otokar Zich）以及他的老师奥托卡尔·霍斯丁斯基（Otokar Hostinsky）为代表的捷克“形式主义”也对布拉格结构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在穆卡若夫斯基看来，个人历史、根源及前辈们的真实面目才是危险的。然而，正如雅各布森在1925年前后的演讲所证明的那样，形式主义被证明是一种历时性的普遍存在。因此，我们有必要证明存在一个历时及共时的虚拟社区。在雅各布森的演讲中，他展示了一种原始的、出于目的论的形式主义，它处在整个俄罗斯文化史之中，自斯维亚托斯拉夫（Svyatoslav）直至普希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丘特切夫，再到维谢洛夫斯基、安德烈·别雷（Andrei Bely）和波捷布尼亚。^③

前锋与后卫：需要共同视野

成员资格意味着领袖和等级的存在或缺失，但总涉及某种判断成员组织架构的决定。有趣的是什克洛夫斯基的夸张表述，他在一次关于形式主义者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中说：“你们有陆军和海军，我们只有四个人，你们有什么好担心的？”^④他这样故意减少成员数量有一种奇异效果，体现了什克洛夫斯基式的修辞天才。尽管没有点明这四人是谁，他只想告诉马克思主义者没什么可怕的。然而，该言论经由社会改革派的支持者大胆说出，暗示着相反的意思：这四位形式主义者实际上与陆军和海军一样强大、有影响力。

什克洛夫斯基在政坛和语文学界都很活跃，而布里克则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倡导自发回归限制学术创造力的任何规则，在它与共同特征之间寻找平衡。他是一个杰出的形式主义者，被同事们称为“天才”和“哥伦布”，他在有生之年仅仅写下两篇文章，并将其文学主张浓缩为一句话：“我想制造点噪音。”^⑤

雅各布森是莫斯科语言学小组首任主席。1914年，莫斯科语言学小组获得俄国科学院的支持与赞助。但当时年仅18岁的他很清楚有必要保护学派的集体起源，他与同伴以及一些语文学专业的学生一起发起了这一学派。的确，将莫斯科语言学小组主席的头衔给70多岁的语文学家费奥多尔·叶甫根尼耶维奇·科尔施（Fedor Evgen'evich Korsh）可作为小组第一次的自奉经典行为。科尔施是拉扎列夫斯基东方语言学院（Lazarevsky Institute of Eastern Languages）（雅各布森在此学习）的古典学家、波斯语文学者。1895年，他成为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1900年成为院士，1915年去世。^⑥尽管他并没有真正担任主席一职，但他的权威帮助那些年轻学者们实现了他们的愿望。

除了语言学和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另一赋予莫斯科语言学小组重要意义的因素在于，其积极与

① Denis Ustinov, “Formalism i mladoformalisty: Postanovka problem,” *NLO*, Vol. 50, 2001, pp. 296–321.

② Jan Mukařovský, “Vztah mezi sovětskou a československou literární vědou,” In *Země Sovětů* 4: 14–15, 1935–1936. 以及穆卡若夫斯基的战争通讯，他抱怨道，“他们在我们的背后贴上了俄罗斯形式主义的标签”。

③ Tomáš Mukařovský Glanc eds., *Formal'naya shkola i sovremennoe russkoe literaturovedenie*; Brno 1935, Moscow: Yazyki slavyanskikh kul'tur, 2011.

④ 转引自 Lidiya Ginzburg, *Pretvorenie opyta*, Riga: Otvas, 1991, p. 146.

⑤ Ilona Svetlikova, *Istoki russkogo formalizma: traditsiya psikhologizma i formal'naya shkola*, Moscow: Novoe literaturnoe obozrenie, 2005, p. 130.

⑥ 关于科尔施对俄罗斯语言学的重要性的研究，参见 A. A. Shakhmatov, “Fedor Evgen'evich Korsh: Nekrolog,” *Izvestiya imperator-skoy akademii nauk* 9 (5): 389–391, 1915.

当时最好的诗人展开合作。这些诗人包括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阿谢夫（Aseev）和曼德尔什塔姆（Mandelstam），还包括阿列克谢·克鲁乔内赫（Kruchenykh），他以一篇名为《俄罗斯诗歌中的性爱倾向》^①的论文进入莫斯科语言学小组。雅各布森在他关于赫列勃尼可夫诗歌的专著《最新俄罗斯诗歌》里将当代诗歌纳入研究视野。^②后来在布拉格语言学小组里他再次尝试这一做法，与泰格（Karel Teige）、奈兹瓦尔（Vítězslav Nezval）、万楚拉（Vladislav Vančura）等先锋派诗人合作。^③

艺术实践与理论分析之间，历史与政治之上

形式主义者们的艺术实践，如什克洛夫斯基的回忆录、雅各布森的超理性玄语（zaum）试验或蒂尼亚诺夫后期的写作，都显示出自我身份的独特模式，处于艺术创作与理论建构的疆界之间。他们与诗人们的合作表明他们期望改变公众讨论当代文学的话语，还表明他们期望将其研究与历史相关联，历史的呈现方式源于这个团体中的成员各具特性，但并非对手。

然而，历史的关联性实则是个挑战，由于各种外界压力，其主要成员曾暂时或永久居住国外。列夫琴科写道，什克洛夫斯基觉得“在柏林时为抛离历史而震惊”，他1925年之前都生活在柏林^④。列夫琴科将什克洛夫斯基的地位和艾亨鲍姆的自我认同当作“建构历史主体性的方式”^⑤。在他看来，形式主义者们在1924年“重聚到一起”，建立了各自的影响。

一方面，他们将自己的创作献给当时的偶像诗人，比如，1924年蒂尼亚诺夫将以《幕间》（The Interval）为名而出版的一部当代诗歌研究献给了帕斯捷尔纳克。另一方面，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塑造了一种彼此紧密的联系。蒂尼亚诺夫把他的文章《文学事实》（Literary Fact）献给什克洛夫斯基，后者则把他的著作《散文理论》（Theory of Prose）献给了艾亨鲍姆。这些敬献“将纲领性文本转换成编码的消息发送给朋友和同事，从他们熟悉的视角重复讲述同一问题”^⑥。有趣的是，考虑在何种程度上将学术圈作为一种结构形式影响了形式论学派的实践本身，这尤其体现在他们对俄罗斯文学史上类似团体及文学日常生活的概括研究中。艾亨鲍姆讨论了文学的内部本质及其与日常生活的关系。非常明显，年轻的形式主义者偏爱文学团体并将沙龙作为其研究的对象。^⑦

在政治维度上，学术圈的概念同样是模糊的。一方面，人们关注纯学术问题，故意将任何意识形态、任何政治问题及任何非学术层面的内容排除在外。文学和其他文化活动被视为普遍存在；同样，探讨这些现象时也没有考虑任何外在因素。即便研究文学的态度，从定义上看似处于文本外，仅仅在更为宽泛的语境下属于文学，通过宗旨（ustanovka）而进入文学作品之中。然而，研究形式论学派的专家维克多·厄尔利希（Victor Erlich）颇有洞察地指出，艾亨鲍姆所谓的日常生活包含某种矛盾，试图创造一种“内在社会学”的文学学。另一方面，形式主义者与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却是无可

① Roman Jakobson, “Moskovskiy lingvisticheskiy kruzhok: Podgotovka teksta, publikatsiya, vstupitel'naya zametka M. I. Shapira,” *Philologica* 3 (5-7): 361-379, 1996.

② Roman Jakobson, *Noveyshaya russkaya poeziya*, Prague: Politika, 1921a.

③ Petr Čermák, Claudio Poeta, and Jan Čermák, eds., *Pražský lingvistický kroužek V dokumentech*, Prague: Academia, 2012, pp. 222, 255, 614.

④ Jan Levchenko, *Drugaya nauka: Russkie formalisty v poiskakh biografiy*, Moscow: Izdatelskiy dom vyshey shkoly ekonomiki, 2012, p. 69.

⑤ Jan Levchenko, *Drugaya nauka: Russkie formalisty v poiskakh biografiy*, Moscow: Izdatelskiy dom vyshey shkoly ekonomiki, 2012, p. 69.

⑥ Jan Levchenko, *Drugaya nauka: Russkie formalisty v poiskakh biografiy*, Moscow: Izdatelskiy dom vyshey shkoly ekonomiki, 2012, p. 70.

⑦ Mark Aronson and Solomon Reiser, *Literaturnye kruzhki i salony*, Leningrad: Priboy, 1929 以及 Boris Eikhenbaum, “Literaturnaya domashnost',” in *Moy vremennik*, Leningrad: Izdatel'stvo pisateley v Leningrade, 1929, pp. 82-86.

置疑的。在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成立五周年庆典上,语言学家及民俗学家阿列克谢·布斯拉耶夫(Aleksei Buslaev)(1920至1922年任主席)运用时事政治术语表明“(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主要任务是一种方法论上的革命”^①。同样,雅各布森拥护革命这一术语,将语文学探讨视为“斗争”或“战争”。艾亨鲍姆也强调说:“所谓的形式方法源自为文学科学所进行的抗争,文学应是一种独立且真实的科学,它不是某一特定方法论的产物。”^②

该集群中的一些成员密切关注政治事件,将其转述为自己的学术话语,尽管雅各布森关于革命对俄语影响的著作(1921)仅仅关注语言学,除此之外并没有评价革命事件,但的确有些莫斯科语言学小组以及后来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成员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对政治主题的兴趣。雅各布森简短地提到与苏维埃作家协会人员的首次会面,他自己令人诧异地给予列宁非常正面的评价,还提到了布哈林以及他对形式主义的评价,^③而那时雅各布森居住在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为苏维埃外交使团工作至20世纪20年代末),并且从未明确支持苏维埃政权。在布拉格,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成员们研究了捷克斯洛伐克首位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的创作^④。雅各布森还尽力促成马萨里克访问苏联。^⑤1920年马宗的作品《俄罗斯战争革命用语(1914—1918)》在巴黎出版之后,雅各布森的两位同事谢尔盖·卡尔采夫斯基(Sergey Kartsevsky)和叶卡捷琳娜·伦佩尔(Ekaterina Rempel)写下关于战争、社会变迁以及语言学方面的著作。

重建—复兴还是暮年—解体?

理解形式主义集群的关键在于冲突、分歧、排挤异见的过程和内部危机。这些特点最生动的例证来自20世纪20年代早期形式主义集群的解散,而这恰好与重建彼得堡诗语研究会的计划不谋而合。形式主义集群内部分歧^⑥与来自苏维埃当局的破坏互相重叠。先锋时期其他团体的做法也扎根于形式主义:建立共同的信仰与排挤战略共同存在。除了学术环境的变化,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还发起“深化理论前线的阶级斗争”^⑦。

这个年月里,苏维埃文化政治得以重构的同时,形式主义者则在讨论进一步推进工作的可能性。其一在于编写新的俄罗斯文学史。什克洛夫斯基写道:“我打算与蒂尼亚诺夫和艾亨鲍姆合作从我们的视角撰写文学史。”^⑧同样具有建设性的口吻弥漫在形式主义者关于团体解散的讨论中。先前同事们的创作被认为是颓废的、是异端邪说,如同雅各布森所说,“混乱”是解体的原因。

形式主义思潮这一戏剧性的发展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雅各布森与什克洛夫斯基之间的书信往来中可见一斑。什克洛夫斯基在信中请求雅各布森从捷克斯洛伐克回到苏联,^⑨他希望推进形式论学派

① Maksim Shapir, “Vstupitel'naya zametka,” *Philologica* 3 (5/7), 1996, p. 363.

② Boris Eikhenbaum, “The Theory of the ‘Formal Method’,” in *Russian Formalist Criticism: Four Essays*, edited by Lee T. Lemon and Marion J. Reis,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5, pp. 102–139.

③ Tomáš Glanc eds., *Formálnaya shkola i sovremennoe russkoe literaturovedenie*, Brno 1935, Moscow: Yazyki slavyanskikh kul'tur, 2011.

④ Roman Jakobson, “Masarik o yazyke,” *Central'naya Evropa* 3, pp. 270–276, 1930; Roman Jakobson, *Jazykové problémy v Masarykově díle: Zvláštní otisk z páteho svazku Masarykova shorniku*, Prague: Prague Linguistic Circle, 1930.

⑤ 关于这些事件的描述,详见 M. Y. Sorokina, “Nenadzhnyj, no absolut'no ne zamenimyj,” and “Delo Masaryka–Jakobsona,” in *Memoriam: Istoricheskiy shornik pamyati A. I. Dobkina*, 116–142, St. Petersburg: Feniks, 2000.

⑥ 比如,什克洛夫斯基与雅各布森拒绝艾亨鲍姆关于文学日常生活的论述。

⑦ “谈谈杂志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和“谈谈共产主义科学院的工作”(1931)可作为对知识分子圈子不断提高监管力度之活生生的例证。

⑧ 转引自 Marietta Chudakova, “Sotsial'naya praktika, filologicheskaya refleksiya i literatura v nauchnoy biografii Eikhenbauma i Tynyanova,” in *Izhrannye rahoty*, Moscow: Yazyki russkoy kul'tury, 2001, pp. 433–454.

⑨ 在那里,他为苏维埃服务,直到1934年捷克斯洛伐克才承认苏联。

的发展,因为按照他的说法,他们早期“出于本能”工作,而现在“问题都已经被揭露出来了”^①。

然而,什克洛夫斯基并不认为所有形式主义者的研究都是可靠的。谈及艾亨鲍姆及其关于文学日常生活的研究,什克洛夫斯基写信给雅各布森说:“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晚期著作退回到折中主义,他的文学日常生活是最粗浅的马克思主义。”^②新的形式主义期望能更具纲领性,而且即便在最杰出的代表人物的学说中也要排除异见。

以对抗的形式强调集体的观点也是雅各布森观点的特点。在给什克洛夫斯基的信中他写道:“我给特鲁别茨柯伊(Trubetskoy)写信时提到,蒂尼亚诺夫和我打算不惜一切代价重建彼得堡诗语研究会,总之要同像艾亨鲍姆那些人所持的反对意见抗争。”^③

如我们所见,最后通牒式的表述(不惜一切代价)并没有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中。在随后的几年里,形式主义者并没有领导“抗争”,而是反对他们的抗争。那些异见是他们的追随者提出的,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成为形式主义方法适用的领域之一。

为客观理性、精神及宗旨服务

重建彼得堡诗语研究会的愿望与形式主义者坚信科学客观性相关,这构成了塑造形式主义的中心口号,形式主义者所谓的类别不是作为分析工具,而是一种源自坚定的科学学说的社会运动(虽然是一个多样的因此而模糊的学说)。在这一方面,加林·吉汉诺夫(Galin Tihanov)认为“形式主义一些无形的力量让作家远离其书桌,尽管他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但适合学术研究和理性,作家因此需依照情节、策略、韵律和节奏的规则写作。我们这里应该记起布里克的一个(不幸)非常有名的表述:“即便普希金从来没有存在过,他的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仍然会被创作出来。”^④在列夫·托洛茨基批判形式主义的文章中,他富有洞察地评述了理性口号及盛誉背后的角逐:“形式主义是第一个科学的艺术学派。由于什克洛夫斯基的努力(这可是他非常重要的贡献),艺术理论以及部分艺术本身从炼金术被提升至化学科学地位。”^⑤用以补充理性和科学力量的是一种哲学体系,人们期待它提供出语言学工具的一种新维度,并为其主要人物提供多元的社区。扬·列夫琴科(Jan Levchenko)(2012)认为,哲学范式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存在于形式主义者的愿望中的一种内在趋势,一种密集的哲学倾向。雅各布森在(简略版的)胡塞尔现象学中看到这一特点,而另一重要的哲学背景来自活力论。

托洛茨基在之前提到的那篇文章中批评形式主义与活力论之间的联系,“生物学中的活力论呈现世界进程中的各个方面的相同变化,但不了解其内在的关系”^⑥。(雅各布森在1935年的一封信中认为)形式论方法是超越历史时间的工具:它在功能上类似柏格森的活力论的一种生物学维度。^⑦

20世纪20年代末期,雅各布森思想中的生物学以及目的论倾向同他对于语言单位(Sprachbund)

① 转引自 Marietta Chudakova, “Sotsial'naya praktika, filologicheskaya refleksiya i literatura v nauchnoy biografii Eikhenbauma i Tynyanova,” in *Izhrannye rahoty*, Moscow: Yazyki russkoy kul'tury, 2001, pp. 433-454.

② 转引自 Marietta Chudakova, “Sotsial'naya praktika, filologicheskaya refleksiya i literatura v nauchnoy biografii Eikhenbauma i Tynyanova,” in *Izhrannye rahoty*, Moscow: Yazyki russkoy kul'tury, 2001, pp. 433-454; 并请参阅 Aleksandr Galushkin, “I tak, stavshi na kostyakh, budem trubit' sbor...” *NLO*, Vol. 44, 2000, pp. 136-153.

③ 转引自 Marietta Chudakova, “Sotsial'naya praktika, filologicheskaya refleksiya i literatura v nauchnoy biografii Eikhenbauma i Tynyanova,” in *Izhrannye rahoty*, Moscow: Yazyki russkoy kul'tury, 2001, pp. 433-454.

④ Galin Tihanov, “Zametki o dispute formalistov i marksistov 1927 goda,” *NLO*, Vol. 50, 2001, pp. 279-286.

⑤ Leon Trotsky, “The Formalist School of Poetry and Marxism,” in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05, pp. 138-153.

⑥ Leon Trotsky, “The Formalist School of Poetry and Marxism,” in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05, p. 1.

⑦ 显然远远超出我们之前的预期,参见列夫琴科关于柏格森与什克洛夫斯基、柏格森与艾亨鲍姆的研究。Jan Levchenko, *Drugaya nauka: Russkie formalisty v poiskakh biografii*, Moscow: Izdatelskiy dom vyshey shkoly ekonomiki, 2012, pp. 46-58.

和欧亚大陆意识形态的研究密切相关。在此期间，尼古拉·特鲁别茨柯伊（Nikolay Trubetskoy）对雅各布森的意识形态立场产生重要影响，雅各布森宣称变化过程并非偶然出现在语言与文化中，但这一短暂影响不是导致该论断的唯一因素。雅各布森语汇中频繁出现的形容词是“合乎规律的”（zakonomerny），艺术创作是内在的、合乎规律的，同样，斯拉夫文化也是如此（尤其体现在他的《斯拉夫比较文学学的基础》一书中）。在关于艾亨鲍姆研究莱蒙托夫的讨论中，时任国家艺术史研究所当代文学系主任的康斯坦丁·安东诺维奇·什穆柯维（Konstantin Antonovich Shimkevi）注意到艾亨鲍姆将偶然因素视为特定的或者总是必需的。^①

形式主义者们在得分表述中坚持认为，有必要为理性的理论家们创立研讨工作坊，而且还要为研究文化及其终极目的（诗性语言、文化整体，甚至历史都是如此）的哲学家们留有一席之地。

乘着爱的翅膀：一场小小的争执可令人为之一振

这种普遍的且本质上形而上学的设计令人想起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它与存在于私人空间的社区形成巨大反差，成立集群的基础不仅在于相同学术兴趣，还在于成员之间的联系、意趣相投和关爱。学术团体的历史上很少有理论方法伴随着强烈情感的情形，乍看之下，这一理论方法似乎意在建立一个文学素材的客观组织，它排斥传记主义，而聚焦语言本身。

当然，人们必须应对这里出现的多种不可调和的流派，也会质疑在讨论文学学术研究的同时，讨论私人书信和无数的献辞（如上所述）有些不合时宜。但是，这种看似不能成立的结合可以反映出形式主义策略的主要“源泉”。事实上，一些学者将这种公共与个人写作的混合作为学术研究的主题，显示了其重要性。因此，什克洛夫斯基在其作品《动物园，或无关爱情的书信》中将学术主题与个人经历相结合，该作品的副标题是“一部书信体小说”。而蒂尼亚诺夫的学生尼古拉·斯捷潘诺夫（Nikolay Stepanov）将一部独立作品用于讨论朋友书信的历史流派。^② 雅各布森在回应好友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时，同样将传记与诗学研究结合起来，写下《浪掷诗人的一代》（1930）。这些作品在很多方面存在不同，但他们都致力于用书信体的形式将传记经历与概念外形结合起来。他们也用不同的方式证明形式主义者个人空间同时成为他们学术研究的主题，以这种方式创造出研究目标和自我反思之间的一种特殊张力。^③ 书信因此不再属于个人通信的手段，不再与学术行为无关。相反，我们看到什克洛夫斯基的《感伤的旅行》（1930），其中一章名为《书信》，他和艾亨鲍姆非常恰当地在书信往来中讨论了19世纪的书信体风尚。

莉季娅·金茨堡也关注个人表达的相互关系，一方面是传记写作，一方面是学术通讯：“你请求什克洛夫斯基，希望他同意你为他立传，同他相遇，令人有‘把他记录下来’的冲动。你听他讲话的时候，会想起他的著作；你阅读他的著作时，会想起与他的对话。”^④ 这种往复有时会达到表白的高度：“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倾心于文学发展的理论家蒂尼亚诺夫在1929年给什克洛夫斯基的信中写道：“很难想象生活中没有你会怎样。我们这个年纪很难遇到新朋友了，只有道路上的同伴而已。”20世纪20年代末，什克洛夫斯基建议与雅各布森不仅在理论上加深合作，而且出于一个共同目的密切联系：“在一起，共同努力。”^⑤

^① Marietta Chudakova, “Sotsial'naya praktika, filologicheskaya refleksiya i literatura v nauchnoy biografii Eikhenbauma i Tynyanova,” in *Izhrannye rahoty*, Moscow: Yazyki russkoy kul'tury, 2001, pp. 214, 443.

^② N. L. Stepanov, “Druzheskoe pis'mo nachala XIX veka,” in *Russkaya Proza* 3: 74–101, 1926.

^③ 1998年库尔甘诺夫对该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④ Lidiya Ginzburg, *Zapisnye knizhki: novoe sohranie*, Moscow: Zakharov, 1999, p. 7.

^⑤ 转引自 Marietta Chudakova, “Sotsial'naya praktika, filologicheskaya refleksiya i literatura v nauchnoy biografii Eikhenbauma i Tynyanova,” in *Izhrannye rahoty*, Moscow: Yazyki russkoy kul'tury, 2001, pp. 433–454.

在他们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替代形式主义者的那批人合作时,也可以看到爱的主题。年轻的一代先是被当作学术上的继承者,发展形式主义的思想,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被视为失望、嫉妒或无法理解的对象。但对此的回应则是爱。这一冲突的主人公之一是莉季娅·金茨堡,她在给什克洛夫斯基的一封信中写道:“在列宁格勒你严厉斥责我(以及我的文章),在莫斯科尤为如此,别人从未那样责备我。虽然有几天我非常愤怒,但后来平静下来。你知道,在经历这一切后,我对你的爱并没减少,或者说,如果有什么改变的话,我更爱你了,因为一次小的争执会令人为之一振。”^①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集群?

对形式主义最深刻的反思来自雅各布森,这表现在他1935年所作的“形式主义”系列讲座中;在他生命最后一个阶段里,这还出现在他与克里斯蒂娜·泼莫斯卡(Krystyna Pomorska)最著名的《对话录》中。

然而,雅各布森所谓的“团体”仅仅与一种语言(言语社区)有关,或者仅仅与一个种族“团体”(斯拉夫人)相连。

将形式主义视为一个文化圈、团体或学派(联想到这些词所具有的语义内涵)的风险在于我们试图用一致性和连贯性来概括这一系列异质的工程与主张。被视为形式主义的理论家或与形式主义相关的理论家非常明显地渴望超越个体作者的界限。但是,人们似乎不可避免地将形式主义划分为不同流派、阶段和趋势。形式主义者以个体网络的方式采取共同行为,在没有终点的轨迹上运行。但他们对人文学科产生巨大的影响,形式主义者关于到底是什么构成文学研究主题的终极拷问成为现代主义最重大的理论以及政治、文化工程之一。尽管他们试图以“我们”的方式发声,以支持共同的学术策略,并在某些时候表达个人友谊,但是,这一多样化的运动总是受自我批评所限,受控于任何最终假设所出现的怀疑论断。形式主义者注意到其理论无法吸收与社会生活的其他部分相关的艺术演进的辩证概念,他们无法与自己的学生达成一致意见,有时甚至无法与自己之前的著作保持一致观点。因此,他们不断打破一致意见,这不仅为我们理解形式主义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也为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方法留下了一份记录。

(译者:刘丹,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文学翻译)

责任编辑:王艳丽

^① 转引自 Denis Ustinov, “Formalism i mladoformalisty: Postanovka problem,” *NLO*, Vol. 50 (2001), pp. 296–321。